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2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5012-6701-9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88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i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罗庆行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6%印张
字 数	308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1-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赵卫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咏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晟	中山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郭锐	吉林大学	薛松	复旦大学
魏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主任 温尧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rc@fudan.edu.cn

电话: 86 21-6564 2939

传真: 86 21-6564 2939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赵卫华 / 1

周边形势

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 杨晓萍 / 1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

地方外交在中国—文莱合作中的角色与展望..... 罗传钰 支鹏宇 / 33

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
——以2016—2017年中韩关系为例..... 方炯升 / 51

周边国情研究

大变局背景下越南的对外战略与政策走向探析..... 顾强 黄坚 / 81

从越南涉南海话语宣传看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 阳阳 / 104

论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外交——以文在寅政府执政前期的斡旋为例
..... 李家成 张翊梁 / 121

新冠疫情下的地区问题

《贸易联系与供应链韧性：应对新冠疫情新常态》（节选）
.....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学者 / 15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政策的扩散——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杨嘉宜 / 180

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东盟关系30年与中国周边外交发展..... 郭志奔 / 205

会议综述

第十一届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张 婷 / 229
第五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泽宇 / 238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4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4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51
审稿专家致谢..... / 256

Contents

Preface..... *ZHAO Weihua* / 1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and U.S.-India Interaction
..... *YANG Xiaoping* / 11

Research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Role and Prospect of Local Diplomacy in China-Brunei
Cooperation *LUO Chuanyu and ZHI Pengyu* / 33

A Missing “Honeymo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
tries—A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in 2016–2017
..... *FANG Jiongsheng* / 51

Research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alysis of Vietnam’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Dir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Change *GU Qiang and HUANG Jian* / 81

Research on the Hedging of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from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YANG Yang* / 104

A Study on ROK’s Mediation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Take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s Me-
diation in Its Early Years as an Example
..... *LI Jiacheng and ZHANG Yiliang* / 121

Regional Issu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 Trade Linkages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Navigating the COVID-19 New Normal* (excerpt)..... NACAI scholars / 151
- The Diffus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ory YANG Jiayi / 180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Thirty Years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GUO Zhiben / 205

Reviews on Symposiums

- Review on the Eleventh Fudan Symposium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ANG Ting / 229
- Review on the Fifth NAC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ZHANG Zeyu / 238

Appendix

-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 Fudan)..... / 247
-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49
-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51
- Acknowledgements to Reviewers..... / 256

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 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 ——以2016—2017年中韩关系为例

方炯升

【内容提要】战略失稳对中国周边外交大局有深刻挑战，其中尤以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关系发展良好、预期不足背景下突发的战略失稳现象为甚。本文尝试论证，国家间不对称结构所带来的结构性错误知觉，是导致战略失稳在预期不足状况下爆发的重要原因。不对称结构中的大国与小国对彼此的关注程度不同，这种关注差距进而引发两国在面对双边关系变化时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最终导致小国出现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以中韩关系为案例的研究表明，韩国决策者在中韩“蜜月期”过度乐观，过于自信地看待中韩关系改善的影响，而又未能分辨出中国向韩国发出警告的核心信息，导致其采取有损中国利益的投机行为。而当中韩关系出现下降趋势时，韩国决策者又过度悲观地认为与中国的冲突将影响本国自主权与人民安全，放大了中国对韩反制的力度认知，终致带来严重的战略失稳。保障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在于建构超越地缘政治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结构性错误知觉；战略失稳；周边外交；中韩关系

【作者简介】方炯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在中国周边外交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战略失稳现象仍在局部发生，为周边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与战略稳定相对，战略失稳是指中国同周

边国家的关系由相对平稳的较高水平滑落，进入动荡不安乃至对抗冲突的状态。^①值得注意的是，仔细考察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发生，可以发现一部分战略失稳事件并非由蓄意挑衅导致，而是在预期不足的状况下发生。这种状况是指，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轨道，并未相互视为威胁或产生无法妥协的利益冲突，但两国出乎意料地发生对抗。^②厘清战略失稳在预期不足状况下发生的原因与作用机理，对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2016—2017年中国与韩国之间发生的外交危机，是预期不足状况下产生战略失稳的典型案列。危机爆发前，中韩关系已经发展到建交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国完成自贸区谈判，韩国加入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实现韩国总统首次参加中国抗战胜利日阅兵，舆论称之为中韩关系的“蜜月期”。两国也已建立起国防战略对话机制、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与国防部直通电话等战略沟通方式，在限制朝鲜核武器发展等事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广泛对话合作。因此，在韩国政府做出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决策并引发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后，韩国政府与国际关系学界仍然普遍对中韩关系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中韩双方最终可以实现妥协，维护战略稳定，^③即使在中国认为中韩关系不会受到严重冲击的观点也具有一定影响力。^④

然而，事与愿违，韩国政府决定部署反导系统最终带来了一场外交危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对中韩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数据，在危机爆发前，中韩关系已连续65个月处于“友好”水平。危机终结了这一趋势，并导致中韩关系在数月内下降到2000年前后的状态。^⑤中韩关系

①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另一种现象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短期内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快速上升，对此也应给予简要界定。如果这种状况出现在两国关系较好时期，则可称为“战略突进”。例如，200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在当年实现快速提升。如果这种状况出现在两国关系低谷阶段，则可称作“战略回暖”。例如，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后，中菲关系就曾经经历“战略回暖”。

② 这种预期不足下产生战略失稳的状况类似于既有研究中所言的“非故意后果”。参见 Patrick Baer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ts Typology and Result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6, no.2 (1991): 201-210。

③ 《在韩国部署“萨德”时，我们会否像在中国“大蒜浪潮”中那样进行报复》，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2月25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9627000>。

④ 典型案例如下文即将引用的清华大学中外关系研究团队在危机之初也未能预判到中韩关系会出现如此显著与长期的倒退趋势。参见曾绍毓：《“萨德”事件后中韩关系不会过度恶化》，《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4期，第159—161页。

⑤ 齐桐萱：《中韩关系的改善限度》，《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161—163页。

显然已经因此次危机出现实质性降级，其下降水平甚至远超近年来得到诸多研究关注、被认为同属“从高峰期大幅下降”的中澳关系（参见图1）。^①然而，2017年中韩两国就反导问题达成阶段性共识后，两国关系即迅速得以修复，充分证明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利益冲突并未达到无法妥协的地步。^②那么，中韩关系的下降程度为何会出乎事先预料，在极短的时间内销蚀过去十余年的互信积累，由“蜜月”下降到谷底？为何中韩两国未能在反导问题尚未对两国关系造成巨大影响之前就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妥协？这些问题迄今仍未能得到充分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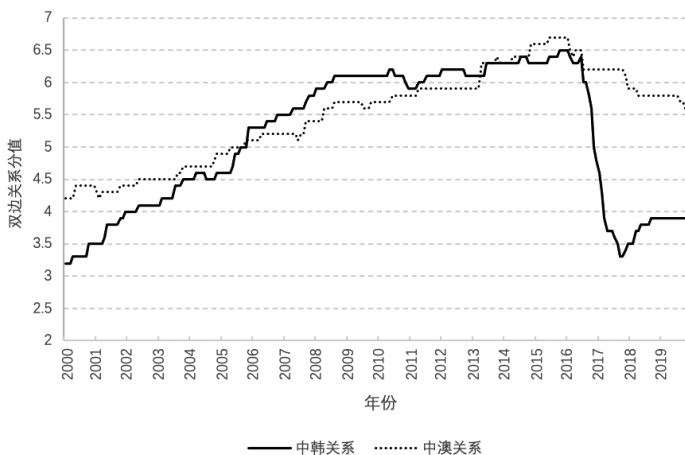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9年中韩、中澳关系变化趋势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清华大学中外关系数据库自制。^③

^① 关于中澳关系“大幅下降”及其原因的论述，可参见许少民：《国家利益、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置》，《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52—86页；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22—59页。

^② 中韩双方的阶段性共识，主要包括中韩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韩国做出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的表态以及无意损害中方安全利益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中韩双方是在暂时搁置反导系统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缓和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中韩双方能够更早达成共识与妥协，两国完全可以妥善管控分歧，韩国部署反导系统也就未必会对中韩关系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参见《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1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_673089/xghd_673097/t1513135.shtml。《人民日报》“钟声”专栏的评论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见《着眼中韩双方共同利益》，《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第21版。

^③ 参见《中外关系数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站，<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因2020年的数据尚未完全公布，故本图数据仅呈现至2019年。

本文尝试运用中韩外交危机的案例，论证结构性错误知觉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在预期不足状况下发生战略失稳，导致失落的“蜜月”的重要原因。文章将首先梳理学界对战略失稳问题的既有解释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对称结构导致错误知觉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实证研究探析错误知觉对中韩关系的影响逻辑。

一、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问题的既有研究

针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为何出现的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提出了同盟体系论、“楔子战略”论、互信机制论、国内政治论四类研究范式。

第一，同盟体系论。同盟体系论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同盟体系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核心因素。美国将中国作为同盟体系的假想对手，为此强烈防范盟友同中国发展密切关系，损害联盟的凝聚力与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①随着中美权力格局的转变，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抗态势，通过加大战略投入、强化同盟体系以及挑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等方式，迫使周边国家“选边站”。这使得周边国家的安全压力显著上升，传统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格局难以为继。^②当体系安全压力上升时，同盟体系的作用在周边国家国内决策中的地位相对上升，因此周边国家只得通过牺牲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换取美国保护其安全的承诺。^③具体到韩国而言，在朝鲜密集举行核试验导致其安全状况恶化的背景下，韩国必须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与“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以维护自身安全，因此只得接受美国的方案，以中韩关系作为代价而“留住美国”，维护自身最为重要的安全利益。^④然而，在同盟体系论的解释逻辑中，无论是体系压力还是同盟体系调整等自变量均属于结构层次的宏观变量，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发生改变，难

① 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② 刘丰、陈志瑞：《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第4—25页；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第109—138页。

③ 凌胜利：《双重困境与动态平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美国亚太盟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70—91页。

④ Choi Yong-sub, “Keeping the Americans In: The THAAD Deploymen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Context of Sino-American Rivalry,”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41, no.4 (2020): 1-21.

以对发生在中观与双边层面的战略失稳进行合理解释。例如，2017年下半年，朝鲜核武器对韩国造成的威胁和美朝之间的对立程度仍然严峻，中韩关系却能够在体系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①这显然与同盟体系论的观点相背离，也表明中国周边国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通过自我调适选择有利的策略。^②因此，同盟体系论对战略失稳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第二，“楔子战略”论。“楔子战略”论指出，美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分化与挑拨是造成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重要原因。“楔子战略”可以视作一种反同盟战略，主要目标是分化对手的联盟或阻止对手建立联盟。^③离间的手段既可以是威慑性、胁迫性的，也可以是利诱性、补偿性的。^④威慑性、胁迫性的手段主要通过向对手的同盟施压，加剧对手与同盟之间战略利益的裂痕，从而促使对手与同盟之间发生分化。利诱性、补偿性的手段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对手的理性判断，诱导其做出背离同盟或拒绝结盟的选择。^⑤两种策略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使用，从而起到更好的分化效果。美国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假想敌。尽管中国从未试图在周边建立同盟体系，但美国仍从自身的战略思维出发，对中国实施“楔子战略”，试图抑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⑥在中韩外交危机中，美国显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破坏作用，通过推动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挑拨中韩关系发展。^⑦然而，“萨德”反导系统这一“楔子”在中韩关系发展进程中早已存在。至少自2014年起，美国就尝试在中韩两国之间打下这一“楔子”，但当时中韩两国始终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管控美国分化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⑧直

① 郑继永：《朝鲜半岛局势转圜：动因、评估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5期，第24—32页。

② Yul Sohn, “South Korea under the United States–China Rivalry: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in Trade Policymaking,” *The Pacific Review* 32, no.6 (2019): 1019–1040.

③ 韩召颖、黄钊龙：《楔子战略的理论、历史及对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62—72页。

④ 姜鹏：《从属侧施压：同盟强化还是同盟瓦解？——“进攻性楔子战略”成败的政治条件及其类型化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3期，第29页。

⑤ 钟振明：《美朝之间强压型互动的联盟分化逻辑——一种楔子战略的分析》，《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1期，第50—58页。

⑥ 王晓虎：《美国楔子战略与亚太联盟预阻》，《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58—77页。

⑦ 凌胜利：《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5期，第46—57页。

⑧ 刘冲：《美国酝酿在韩部署“萨德”系统问题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13—16页。

到2016年,中韩两国对“萨德”问题的管控突然失灵。因此有学者指出,美国的挑拨本身并不足以导致中韩外交危机,反而是韩国的政策转向与对美国的积极配合给中韩关系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①因此,“楔子战略”论也难以为中韩外交危机提供充分的解释。

第三,互信机制论。互信机制论指出,双边关系的稳定建基于两国间相互信任的程度。决定双边关系的最根本因素,是双方是否能够在彼此都视为根本价值的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并提供令对方信任的承诺。^②还有学者认为贸易也是一种重要的互信机制,如果双方能够在经济上实现深度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开展广泛的贸易往来,也有助于实现“以经促政”,强化双边关系的稳定性。^③更进一步而言,如果两国能够在政治共识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密集的互信机制,通过一系列规范将双边互动的成果固定下来,则两国关系的基础将更加坚实。^④即使周边国家的外交决策者有意调整对华关系,这些互动成果与互信机制也将限制领导人的选择范围,避免两国关系过度滑落。^⑤然而,本文的研究案例中韩关系的发展与互信机制论的假设背道而驰。在中韩“蜜月期”,两国互信机制密集,双边经贸往来增长迅速,但无论是互信机制本身还是中韩的相互依赖关系都没有为两国的战略互信水平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提升,这些机制的象征性作用大于实质性作用。韩国政界与学界对中韩互信机制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的言论也为数不少。^⑥与之相对的是,在同一时期,美韩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提升反而更具现实意义,两国通过战略互信程度的提高在延伸威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对、美日韩三国情报交流等方面的机制建设均取得重

① 孙茹:《理解中国对“萨德”问题的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4期,第3—6页。

②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1—133页; Thomas Scheber, “Strategic Stability: Time for a Reality Che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53, no.4 (2008): 893-915.

③ Lawrence Sáez, “Trade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 no.4 (2008): 698-716.

④ 王昆:《机制建设与美苏消极战略稳定及其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第21—28页。

⑤ Wen Zha, “Personaliz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a Polici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7, no.2 (2015): 242-268; Thomas Fingar and Fan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6, no.4 (2013): 125-138.

⑥ Lee Ji-yong, “THAAD Deployment and Korea-China Relations,” IFANS Focus, February 29, 2016, www.ifans.go.kr/knda/ifans/eng/pblct/PblctView.do?clCode=P11&pblctDtaSn=12527&koreanEngSe=ENG.

大成果。^① 这表明，互信机制的建立与否对战略失稳的影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机制在双边关系上升时可能起到助力作用，但在双边关系滑落时难以实现约束与兜底。

第四，国内政治论。国内政治论强调政治精英与社会观念撬动国际结构的显著作用。周边国家的政治精英高度关注与中国发展关系是否有助于其执政，并可能因国内压力而改变对华态度。^② 有的政治精英认为，发展对华关系有助于本国发展，增强执政的绩效与正当性，因此应努力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③ 有的政治精英则将诋毁对华关系作为对前任政府清算的一部分，导致外交关系被国内政治斗争绑架。^④ 对华关系有时还取决于周边国家内部普遍认同的战略文化。例如，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对制衡或追随效果的看法等均可能影响具体的政策制定。^⑤ 还有学者尝试融合互信机制论与国内政治论的看法，认为互信机制的缺乏所导致的承诺不可信，以及国内政治为决策带来的高昂观众成本，是促使国家选择冲突战略的重要原因。^⑥ 然而，国内政治论同样无法充分解释中韩关系的变化。在中韩外交危机前后，韩国发生了执政派系的更迭。但是，文在寅新政府上任后，对外交危机的态度与此前的朴槿惠政府相比并无显著差别。^⑦ 朴槿惠与文在寅处理中韩关系的态度本质上仍然都是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只是具体采取的路径不同。^⑧ 因此，直至文在寅上任半年后，中韩关系才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同时，有学者借助对韩国民众的问卷调查指出，即使在中韩“蜜月期”，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⑨ 事实上，亲美

① 韩献栋：《美韩同盟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93—95页。

② 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56—87页。

③ Cheng-Chwee Kuik,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no.4 (2013): 429-467.

④ 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120—139页。

⑤ Bernard Fook Weng Loo, *Middle Powers and Accidental Wars: A Study in Convent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pp. 35-67.

⑥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15—18页。

⑦ 李敦球：《在部署“萨德”问题上文在寅与朴槿惠无本质区别》，《中国青年报》2017年9月13日第6版。

⑧ 顾嘉伟、苏长和：《对冲路径、体系压力与21世纪以来韩国的对冲战略效用》，《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6期，第106—121页。

⑨ 王星星、殷棋洙：《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和中韩关系认识的实证研究》，《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2期，第79—87页。

疏华长期以来都是韩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基本面。^①并且这种对华认知在韩国的保守与进步群体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在朴槿惠与文在寅的政权交替前后也没有明显差异。^②由此可见，韩国社会的对华观念从宏观角度看可以被视作常量，而不是足以影响中韩关系变迁的自变量。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政治精英还是从社会观念的视角出发，国内政治因素都难以完整解释中韩战略失稳的原因。

上述研究之所以很难对战略失稳提供完整的解释，其原因主要集中于层次分析的不完整与能动性视角的欠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层次分析的角度来看，以上解释涵盖了国内层次、第三方层次与区域体系层次，但唯独比较缺乏对双边关系这一中层视角的分析。事实上，在战略失稳研究中，双边关系才是问题的主体，对其缺乏直截了当的分析无疑将导致研究缺乏完整性。另一方面，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与能动的二分视角来看，上述分析主要是从结构性视角开展讨论，默认外交危机中的行为体都从属于特定的结构并严格按照结构所划定的理性模式开展行动，这无疑是不完整的。本研究并不意在否定结构的重要意义，但尝试进一步论证行为体认知与应对结构性因素的主观能动性在外交活动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动性视角与结构性视角的融合，可以比既有研究中单纯的结构性视角提供更加完整的解释。^③基于此，下文将尝试建构一种从中层视角出发，重点突出能动性的解释框架，从而为战略失稳问题的现有解释提供补充。

二、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形成方式及其导致战略失稳的路径

国际关系的认知理论可以较好地从中层视角出发，分析行为体的能动性。认知理论强调行为体对彼此的看法可能导致错误的乐观主义或错误的悲观主义，从而误判冲突发生与发展的深刻程度。^④在国际冲突研究中，已经有较多研究者从认知路径开展讨论。他们指出，国家间互动可以塑造一种针对对方国

① 王晓玲：《韩国民众“亲美疏中”的现状、原因及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第46—60页。

② 王晓玲：《韩国社会基本外交立场分析——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观察》，《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1期，第49—60页。

③ 相关讨论可参见诺林·李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刘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

④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第17—32页。

际身份与行为模式的认知。两国的相互认知是否协调，是导致两国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双方能够正确理解彼此的行为动机并释放善意，则双边关系会呈良性发展态势；而如果认知出现失调，双方均以恶意与疑惧去揣测彼此的动机，或一方出现“一厢情愿”的现象，则双边关系会下降。^①更进一步，有学者指出，认知失调并不能随着国家间互动水平的上升而消失。其原因在于，高强度互动可能遮蔽双方之间的固有差异与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隐藏已久的问题在特定情境下爆发。^②两国关系友好时发生的认知失调所带来的“背叛感”，会对两国造成倍加严重的冲击。^③而两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可以成为认知失调的重要来源。不对称关系中的双方面临相同的环境，却拥有差异甚大的诉求，因此很容易产生互动失衡与关系困境。^④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高水平互动状态下认知失调与战略失稳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不对称结构的影响，对本文研究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失落的“蜜月”之谜有较强的启发意义。然而，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潜在的因果关系，却未能提供具体的因果机制，即不对称结构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双边关系并导致战略失稳。^⑤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尝试通过对认知视角相关理论的考察，演绎出不对称结构导致错误知觉，进而引发外交危机的潜在路径。本文的演绎可以用图2进行简要概括，下文将对其进行具体阐述。

第一，不对称结构导致关注差距，进而带来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本文尝试论证，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不对称结构是导致错误知觉，并进而导致战略失稳的重要原因。如果在一组双边关系中，两国的国土面积、经济体量、国防能力与国际地位等都存在显著差距，则可认为这组双边关系形成了不对称结构，其中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在下文中称作“大

① 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4—33页；赵洋：《交往行动、战略对话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2期，第77—105页。

② 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97—126页。

③ Kang-kyu Lee, “China’s Lost Face and the Two Koreas: 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Denver, 2019).

④ 刘乐：《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36—154页。

⑤ 关于因果关系与因果机制之间的区别，可参见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格致出版社，2014，第72—110页。

国”，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称为“小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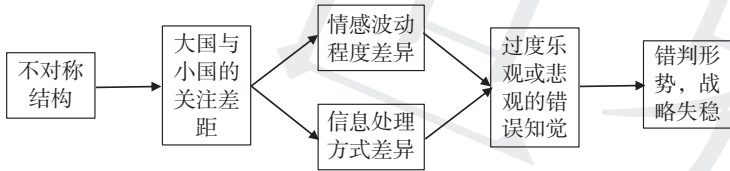


图2 不对称结构引发错误知觉和战略失稳的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不对称结构可能在两国之间带来“关注差距”。对大国而言，它在外交上总有更加重要的议程（例如，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需要处理，从而大国决策者对于小国的关注是有限的，与小国相关的事务在它的外交决策中的优先级较低。因此，大国倾向于对小国关注有限（inattention）。另一方面，如果小国与大国存在地缘上的临近或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则与大国有关的事务将在小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中成为优先级极高的议题。因此，小国倾向于对大国的行动关注过度（over-attention）。关注差距也就由此产生。^②

关注差距可以对决策者的情感波动程度以及信息处理方式两个关键变量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导致外交决策的风格发生改变。^③一方面，关注差距导致两国决策者的情感波动程度出现差距。外交决策者在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时，会产生情感的波动，这种情感的波动又反过来影响决策的各个方面。^④然而，由于外交决策者的注意力是非常受限的，只会对其最为重视的议题投入较多的情

^① 这里的“大国”与“小国”均为相对概念，仅衡量一组双边关系中两个国家的相对强弱，并不意味着绝对实力或影响力的强弱。一组双边关系中的“小国”可能成为另一组双边关系中的“大国”。

^② Brantly Womack, “How Size Matter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4, no.4 (2001): 134;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6, no.2 (2003): 96-97. 当然，不对称结构并不必然意味着关注差距的存在。如果小国与大国之间的联系往来有限，与大国相关的事务在小国的外交决策中的优先级也不高，则两国之间不会存在关注差距。还有学者认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战略文化同样将影响关注差距的意义。参见方长平、宋宝雯：《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第128—141页。

^③ David A. Welch, *Painful Choices: A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0-41.

^④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4 (2000): 116-156.

感，对相对不重要的议题投入有限的情感，由此带来情感波动程度的差异。^①在不对称结构中，大国外交决策者对双边关系的关注有限，因此双边关系的变化对大国决策者所造成的情感波动也有限，大国决策者相对而言会以更加平和的态度看待双边关系的变化。相反，小国外交决策者对双边关系的关注过度，赋予其较多的情感投入，因此双边关系的变化将为小国决策者带来明显的情绪波动，并将表征于其决策之中。^②决策者典型的情感波动包括在两国关系改善时因自身判断得以验证所带来的自信感，以及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因局势失控所带来的失落感。^③

另一方面，关注差距导致两国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存在差距。信息在外交决策中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在不同的国家中，决策者接收与处理信息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大国决策者所面对的外交议题数量众多，情势复杂。鉴于与小国的双边关系在决策者视野中的重要性相对有限，大国决策者在处理与小国的关系时势必采取“抓大放小”的信息处理方式，只关注最为重要、最为利益攸关的关键信息，而选择性地忽略相对不重要的信息。^④与之相对，由于在小国决策者的战略思考中，与小国的双边关系优先级极高，小国决策者势必会希望获得更加完备的信息，对相关领域的政策规划与学术研究投入更多资源。就这一逻辑而言，小国决策者反而可能在对大国开展外交决策时获取更加“面面俱到”的信息。^⑤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将导致大国与小国对当前局势做出全然不同的判断，错误理解对方通过信息所欲表达的意图。^⑥

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同时影响外交决策，导致在同一组双边关系中大国与小国的决策风格产生差异。一方面，大国的决策风格趋向于平稳与连

① 有关决策中注意力的研究，参见练宏：《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215—241页；陈思丞、孟庆国：《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614段批示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3期，第148—175页。

② 有关注意力差距对情感波动程度的影响，参见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柳思思译，尹继武校，《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2—53页。

③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7-93.

④ 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3—64页。

⑤ 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李晓燕、薛晓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52—54页。当然，这一推论的前提是小国有比较完善的外交、情报系统与有实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

⑥ 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第101—103页。

续，对小国已经做出的外交决策很少会改变。其原因在于，情感波动的有限性使大国决策较少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抓大放小”的信息处理方式使大国的决策较少受到信息的干扰，决策将更多按照决策者的既定思路开展，而不是在接收外界刺激后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小国的决策风格呈现出波动反复的特征，在处理与大国的外交关系时常常显得“善变”。这种特征既受到情感波动程度大的影响，在小国的外交决策中带入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也受到“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决策大量受到外界刺激的冲击，难以保持足够的稳定性。^① 双边关系（大国决策者与/小国决策者）在关注差距、情感波动程度、信息处理方式和外交决策风格上的特点参见表1。

表1 双边关系中的关注差距、情感波动程度、信息处理方式与外交决策风格

	大国决策者	小国决策者
关注差距	对小国关注不足	对大国关注过度
情感波动程度	小，相对平和	大，自信感或失落感显著
信息处理方式	“抓大放小”	“面面俱到”
外交决策风格	平稳连续	波动反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导致错误知觉的路径。对于任何决策者而言，准确判断自身所处的战略环境优劣程度，都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② 然而，关注差距所导致的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恰恰会引发决策者错误判断自身所处环境，因此具有较高的危害性。与不对称结构中的大国相比，错误知觉在小国的外交决策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导致小国在面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时过度乐观，在面对两国关系的恶化时又过度悲观。

一方面，两国关系的改善导致小国外交决策过度乐观。在双边关系经过两国共同努力达到高峰阶段后，两国决策者都会倾向于形成一种对未来的乐观认识乃至“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相信两国关系会继续维持向好的趋势，两国之前存在的分歧可以得到化解。但这种乐观认识在两国的表现存在差异。

^① Robert Jervis, *Why Intelligence Fail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6-167.

^②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唐世平、王凯主编《历史中的战略行为：一个战略思维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53—61页。

大国在面对小国时的情感波动有限，同时大国仅会关注数量有限的核心信息，因此大国的乐观心态是相对适度的。然而，小国在面对大国时情感波动剧烈，具有较强的自信感，所接收到的信息又“面面俱到”，容易产生一种两国关系已然取得全面突破的感受。这是一种典型的过高估计自我能力的错误知觉。^①在过度乐观心态的影响下，小国倾向于采取投机性政策，期待可以通过与大国的良好关系而获得大国的包容。即使大国对这种投机行为明确提出警告，也未必能够引起小国的重视。^②因此，错误知觉所带来的投机行为导致两国关系从高位下降，进入恶化通道。

另一方面，在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后，错误知觉又导致小国的外交决策过度悲观。在自身要求未能得到大国满足，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后，小国的决策者无疑会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由于小国决策者对两国关系的关注过度，这种失望情绪将被进一步放大，带来强烈的失落感。而小国决策者“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会对悲观情绪起到自我证实与强化的作用。因在两国关系恶化阶段小国决策者所接收到的信息基本都是带有负面倾向的，从而加剧小国决策者的失落感与对大国的怀疑。相较而言，尽管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会为大国的外交决策带来一定的情感波动，但这种情绪是相对有节制的，并且由于大国决策者的“抓大放小”，这种情绪不会因大量负面信息涌入而被强化，从而保证大国外交决策的相对稳定与连续，但也可能导致大国无法对小国的悲观情绪进行及时的安抚与正面疏导。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的研究提示，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都不是线性变化的，无法由“过度”演进到“适度”或“平和”，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当小国在过度乐观的心态支配下决定采取投机行为后，它已经使大国产生敌意，并在国内带来较高的观众成本。因此，小国的行为改变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单纯地通过取消投机行为而“回到过去”。为了佐证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小国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并在一次次受挫之后陷入悲观

^①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284—292、359—372页。

^② 关于小国在过度乐观心态下采取投机行为，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例如，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33—65页；罗肖：《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第126—150页。

之中。^①

第三，错误知觉导致战略失稳的路径。由上述论述可知，关注差距导致小国决策者错判形势，从而逆转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反而会使得矛盾与冲突加剧。由于这种错误知党内化于小国的外交决策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无论是小国内部执政派系的更迭还是两国之间互信机制的建立，都不足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产生的基础。只要小国在双边关系取得发展时过度乐观而采取投机性的政策，错误知觉就会被诱发。由此可见，如果两国深刻陷入错误知觉，最终将导致失落的“蜜月”：发展良好的战略稳定态势被彻底翻转，在两国关系高峰期取得的成果消弭殆尽，徒留外交危机带来的棘手问题，成为两国修复关系的障碍。

本文借用前辈学人提出的既有概念，将这种不对称结构下的关注差距所引发的错误知觉称为“结构性错误知觉”（structural misperception）。^②相较于立足微观层次，从认知心理学领域开展的错误知觉研究，或立足国内政治层面的战略文化研究，结构性错误知觉呈现了国际政治体系层面所普遍存在的“等级制”现象对决策者的战略思维所起到的框定作用，从而有利于实现微观与宏观层次的结合，还原决策的真实场景：决策者既不是囿于固有结构而毫无自主性的“人偶”，也不会做无视外在环境与条件限制的“无序运动”，而是在外界条件限制与自身决策偏好的张力间艰难行动的主体。

三、中韩不对称结构所带来的关注差距

结构性错误知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有显著的体现。东亚国家中广泛存在不对称结构，同时又特别强调“关系”、情感与价值的作用，导致错误知觉的意义凸显。^③朝鲜半岛问题中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交织，加剧了错误知觉出现

①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179页。

② 这一概念出自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研究，但本文的理论推演与之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对而言，沃马克更关注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而非情感波动程度；沃马克理论的机制化程度相对而言也更低。

③ 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8—80页。

的概率，并已经得到认知理论研究专家的关注。^① 本文试图以中韩关系为案例，论证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失稳现象有重要的影响。

从结构性错误知觉的视角出发，首先应确证中韩关系具有不对称结构。艾伦·金和车维德两位学者曾经系统论述过中韩关系的不对称性。根据他们选择的测量指标，中国不仅在人口与领土面积上远超韩国，经济总量也是韩国的7倍，防务开支是韩国的4倍；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25.4%，超过对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的两倍；中韩贸易每年为韩国贡献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② 因此，他们指出，不对称结构是中韩关系的首要特征，也是韩国领导人所必须面对的外交决策前提条件。

更进一步，不对称结构带来了中韩两国决策者的关注差距。其基本特征在于，中国倾向于将中韩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宏观视角下进行分析，而韩国倾向于将中韩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外交议题进行分析。关注差距的存在，意味着结构性错误知觉的隐患根植于中韩关系之中。

第一，中国在关注中韩关系时，将其作为周边外交宏观视角下的一个具体方向。周边外交与周边国家概念最早在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此后该概念一直在中国外交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③ 回顾近20年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驻外使节会议等中国集中研讨外交外事工作的会议可以发现，中国决策者对本国外交政策与外交重点的分析长期按照“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的框架进行。^④ 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强化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⑤ 中韩关系无疑处于中国周边外交的范畴之中。中国政府在开展中韩关系顶层设计的过程中，倾向于将韩国定位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以及发展东亚区域合作，建立更加均衡的区域体系的重要合作伙伴，也就是将

① Robert Jervis and Mira Rapp-Hooper,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ow Unwanted Wars Begin," *Foreign Affairs* 97, no.3 (2018): 103-117.

② Ellen Kim and Victor Cha,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South Korea's Strategic Dilemma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ia Policy*, no.21 (2016): 101-122.

③ 石源华：《从七十年大视角研究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知识》2019年第5期，第72页。

④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举行》，人民网，2004年8月30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748201.html>；《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中国青年网，2009年7月21日，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07/21/content_2765581.htm；《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新华网，2018年6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⑤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中韩关系的意义置于周边外交与地区局势的宏观框架中进行观察与思考。^①这一思维方式在近年来两国重大互动中也有体现。例如,2014年习近平主席专程访问韩国,在总结访问成果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即重点从周边外交角度对访问成果进行界定,指出“访问充分体现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诠释了我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②

同时,中国学者在观察与分析中韩关系时,也倾向于将中韩关系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现实政治角度而言,韩国既是区域中等强国,又是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盟国,是中国周边外交所需经略的重点之一,在东北亚复杂的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中韩关系发展有利于维护中国周边的和平稳定。^③而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韩国在历史上就始终是中国周边的重要行为体,在文化上也与中国多有相通之处,符合周边外交重视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向和政策取向。^④

第二,韩国在关注中韩关系时,将其视为本国外交的最重要方向之一,与具有同盟关系的美国等量齐观。这一态势萌芽于李明博执政时期。尽管李明博时期韩国在对外政策表述中仍将日本放在中国之前,^⑤但李明博竞选总统期间即明确表示“韩中关系与韩美关系一样重要”。^⑥首次访华期间他又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中韩关系当下的格局,逐渐将中韩关系形塑为韩国外交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同属保守派的朴槿惠当选之初,时任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就指出“美国是韩国的第一外交合作伙伴,中国其次”,明确指出中韩关系在韩国外交中的地位。^⑦2013年朴槿惠上任后首次访华,在访华前连续三天没有正式日程,旨在为访华做好万全准备,这点与朴槿惠首

① Chen Zhimin, “Embracing the Complexities in China-ROK Relations: A View from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36, no.2 (2012): 197-200.

② 《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网,2014年7月4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4/c_126711971.htm.

③ 张清敏:《搞好周边关系,需掌握小国外交的逻辑》,《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第18—20页;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39页。

④ 参见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0页。

⑤ 《详讯:李明博决定紧急召开外交安全长官会议》,韩联社网站,2012年4月13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20413001100881?section=search>.

⑥ 《“韩国CEO”李明博新鲜出炉 难享“蜜月期”》,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0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j/gjxqdb/news/2007/12-20/1110132.shtml>.

⑦ 《为什么美国通尹炳世强调中国外交》,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4月1日,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1094454>.

次访美前的准备完全一致。^①而朴槿惠在执政初期于2013年“先访美后访华”，在执政时间过半后于2015年“先访华后访美”的微妙顺序变化得到韩国媒体广泛关注，同样彰显了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广泛关注与重视。^②进步派的文在寅初次访华期间，对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重要理念多有回应，并表示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感同身受，充分展现出其对中国的深入观察与高度关注，体现出韩国保守进步两派在中国的重要性上存在共识。^③多位韩国前政要也曾指出，中国“现在到了需要承认自己正掌握着解决半岛问题最重要钥匙的时刻”，政府必须不断提升中韩关系，方可实现半岛问题的顺利解决。^④

韩国学界同样认为中韩关系是韩国外交成败的最重要变量之一。经历过朴槿惠、文在寅时代中韩关系的大起大落之后，韩国学界对中韩关系与美韩关系未来发展演化开展了一场大辩论。^⑤有韩国学者直言，韩国正深陷维系美韩同盟和坚持中韩友好关系的“两难抉择”之中。^⑥这种观点在韩国极具代表性。在2016年韩国《中央日报》举行的一次访谈中，受访的多位韩国外交安全问题专家均对中美关系的下行表示高度担忧，认为这一趋势将逼迫韩国“选边站”，从而恶化韩国的外交环境。^⑦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关注差距在中韩关系中有显著的表征。韩国对于中国

① 《朴槿惠4天后访华 正为此做万全准备》，韩联社网站，2013年6月23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30623000100881?section=search>；《朴总统准备与中国的会谈，周末三天无日程》，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6月24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1881810>。

② 《朴槿惠进入执政后半期，“先访华后访美”引关注》，韩联社网站，2015年8月31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50831002300881?section=search>。

③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人民网，2017年12月15日，<http://korea.people.com.cn/n1/2017/1215/c407881-29708178.html>；《外交部发言人——赞赏文在寅对中国人民展现的友好情谊》，人民网，2017年12月15日，<http://korea.people.com.cn/n1/2017/1215/c407881-29708338.html>。

④ 李洪九：《对强大邻国中国的期望》，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6月3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1694573>；朱铁基：《韩美关系与中韩关系的建设性共存》，《成均中国观察》2016年总第15期，第12—18页。

⑤ 张弛：《大辩论与大转折——朴槿惠时代中韩关系的反思与启示》，《东北亚论坛》2018年第1期，第114—117页。

⑥ 李相万：《“萨德入韩”与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6期，第9页。

⑦ 《中美对抗带来的危机远超中朝密切联系的影响，“萨德”就体现了这一点》，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9月1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0531221>。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高度重视中韩关系。^①然而应当承认，中国对中韩关系的关注并非中国外交的独立重要方向，而是周边外交框架下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中韩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优先级和重要性与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的关系难以相提并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韩国的关注热度相较于大国而言也偏低。^②相反，对韩国而言，中韩关系则是韩国最重要的外交方向之一。韩国决策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对中国行为的跟踪与研判之中，韩国学界也将中国政治与外交作为研究重点。关注差距的存在带来了决策者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而韩国外交风格中由历史与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浓重感情色彩，以及受制于地缘环境而对外部变化极为敏感的特质，无疑使得错误知觉的影响进一步被放大。^③在特殊事态的诱导下，结构性错误知觉将成为中韩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四、结构性错误知觉导致中韩战略失稳的逻辑

在关注差距的影响下，韩国决策者在处理中韩关系时，呈现出在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两个极端之间波动的特征。受到过度乐观心态的影响，韩国决策者在做出部署“萨德”系统的投机性决策时，未能充分预估中国的坚决反对态度。而当中韩关系出现实质性下落后，韩国政府又显现出过度悲观的心态，显著高估中国反制措施的深广程度。结构性错误知觉的深刻影响，导致中韩关系在较短时间内快速下滑。

（一）韩国决策者的过度乐观及其投机心理

韩国决策者在中韩关系“蜜月期”过度乐观，认定中国应当且能够接受其采取的投机性政策。

第一，韩国过度自信地看待中韩关系改善对朝核问题的影响效果。这点

① 《习近平同朴槿惠会谈 就全面充实深化中韩关系达成四点共识》，人民网，2013年6月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627/c365951-21999393.html>。

② 中国知网的数据可以为该观点提供进一步的佐证。2020年底，在中国知网以“中韩关系”为主题进行搜索，共得到1167篇中文文献；相较而言，搜索“中美关系”可得到25237篇中文文献，搜索“中日关系”可得到15632篇中文文献，搜索“中俄关系”可得到2752篇中文文献，搜索“中欧关系”可得到2090篇中文文献，关注的差异度明显。

③ 方秀玉：《战后韩国外交与中国——理论与政策分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第130页。

在2016年初的中韩国防部热线通话事件上有显著体现。2015年12月31日，中韩国防部直通电话正式开通，时任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与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举行了首次通话。^①这一热线的开通使韩方长期的提议终于得以实现，韩国国防部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为韩中军事交流添上浓重一笔的历史性通话”。^②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韩方可以借助热线和中国就半岛局势进行战略协调与沟通，甚至乐观地预测热线沟通可以起到牵制朝鲜的作用。^③然而，2016年1月6日朝鲜举行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国防部在第二天尝试与中方通话，却未能接通。^④1月8日，时任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通话，但据韩媒报道，这次通话的时间也经过了两次推迟。^⑤在防务热线不通和外交沟通推迟后，韩国政府对中方表示“失望”，甚至认为在直接关系到韩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表现过于消极，不符合韩国对中韩关系的期待。^⑥

韩国的激烈反应充分体现了关注差距对小国情感波动程度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未对中韩国防部热线事件做出正面回应，但从中国的外交风格与决策体制出发，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暂时无法回应韩国通话请求的原因在于，中国需要考量其回应对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大局可能造成的影响，难以迅速做出具有倾向性的表态。事实上，在1月8日中韩外长的通话中，中方已经明确提出半岛无核化、和平稳定、对话解决等不偏不倚的立场。^⑦而韩国对中韩关系的发展程度显然赋予了过于自信的期待，认为中国可以在朝核问题上快速做出决

① 《国防部：中越、中韩国防部直通电话正式开通并举行首次通话》，中国国防部网站，2015年12月31日，http://www.mod.gov.cn/reports/201412/zb/2015-12/31/content_4634682.htm。

② 韩联社：《韩中国防部热线五年修成正果，一举多得意义重大》，2015年12月31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51231003700881?section=search>。

③ 《韩民求与常万全举行首次热线通话，在美国与日本后的第三通》，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1月1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9343221>。

④ 韩联社：《韩中军事热线打不通，中方或尚未明确朝核对策》，2016年1月7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107006200881?section=search>。

⑤ 《中韩外交考验上升》，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1月9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19383787>。

⑥ 李熙玉：《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与朝鲜半岛“新常态”》，《成均中国观察》2016年总第14期，第6—11页。

⑦ 《王毅应约同韩国外长尹炳世通电话》，新华网，2016年1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08/c_128610424.htm。

断。^①因此,当中国未能满足韩国的通话请求时,韩国决策者的自信感遭遇严重挫败。部署“萨德”系统以确保本国获得安全保障,也就成为一种具有诱惑力,似乎有利于挽回尊严的选择。

第二,韩国“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方式导致其低估了中国的反制决心。2016年初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部署“萨德”系统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国防等渠道向韩国提出反对意见,希望韩国做出慎重考虑,通过对话协商化解朝核问题的挑战。^②中韩两国领导人也曾利用多边会议场合,就此问题进行直接沟通,传递了明确信息。^③然而,韩国决策者始终被过度乐观的心态所笼罩,认为部署“萨德”系统是一项“纯粹的防御性政策”,并且“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因此中国应当承认与理解韩国的决策。^④朴槿惠在面对中国的强烈反对时,显得调门颇高,认定中国最终将接受韩国的立场,因此不必与中国妥协。她曾利用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等场合多次表示,部署“萨德”系统是出于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考虑,因此“绝不允许对其进行重新研究”。^⑤

韩国决策者在中国提出明确警告的背景下仍不考虑改变自身立场,与其信息处理方式有密切关联。在2016年7月韩国政府正式公布将部署“萨德”系统之前,中国政府仍然希望韩国能够及时改变立场,重新考量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为此在大局上向韩国释放善意。例如,2016年3月中韩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以及2016年6月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在明确表达对“萨德”问题关切的同时,仍然重点强调中韩政治互信增强、发展战略对接与人文交流等合作议程,这无疑是在向韩国政府传递中国的良好

① Jaganath Sankaran and Bryan L. Fearey,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in South Kore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38, no.3 (2017): 331.

② 《中韩举行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新华网,2016年2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16/c_1118062103.htm。

③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人民网,2016年4月1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401/c64094-28243431.html>;《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新华网,2016年9月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5/c_1119511642.htm。

④ 韩联社:《详讯:青瓦台称部署“萨德”系统是应对朝鲜威胁的自卫防御措施》,2016年7月8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08004600881?section=search>;韩联社:《韩防长:部署“萨德”系统旨在防御朝鲜核导,并非针对第三国》,2016年7月8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08002800881?section=search>;韩联社:《韩外长:部署“萨德”系统反导系统不针对他国》,2016年7月11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11002600881?section=search>。

⑤ 《朴前总统:如果“萨德”系统因政争消失,韩国也将不复存在》,《朝鲜日报》2016年7月15日, 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6/07/15/2016071500277.html。

意愿。^①

然而，韩国政要并未准确地在各种信息中辨识与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诉求，反将中国政府释放的善意视作中国对韩政策的主流，并由此得出中国不会对韩国实行强烈反制的错误结论。例如，国务总理黄教安曾于韩国政府公布部署“萨德”系统决定前夕访华，应当最理解中国政府的核​​心诉求。然而，他却在接受议会质询时表示，中韩关系处于很高水平，因此中国不会轻易对韩国进行反制。时任韩国外长尹炳世在同一场质询中也表示，不认为中国会对韩采取反制措施。^② 尹炳世在多方场合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又指出，中韩两国可以“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必因特定事件影响两国关系。^③ 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表示，韩国军方已经与中方在“萨德”问题上充分交换意见，中国不应对其进行过分解读。^④ 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与韩国驻华大使也曾表态指出，部署“萨德”系统同与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开展合作将并行不悖，中韩双方可以在因“萨德”系统造成的摩擦存在的情况下实现共赢。^⑤ 这些韩国政府对华决策圈中核心人物的表态，显然都只看到了中国维护中韩关系大局的一面，严重低估了中国对“萨德”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中国在反导问题上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从而损害了韩国决策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二）韩国决策者的过度悲观及恐惧心理

韩国决策者在中韩关系出现下行趋势后过度悲观，放大了中国的警告与反

① 《习近平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人民网，2016年4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401/c64094-28243431.html>；《习近平会见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人民网，2016年6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629/c64094-28509513.html>；《李克强同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举行会谈》，人民网，2016年6月29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629/c64094-28505608.html?segbp>。

② 《黄总理：中韩经贸关系密切，中国不会轻易施加报复》，《朝鲜日报》2016年7月30日，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6/07/20/2016072000284.html；韩联社：《韩总理：中国对韩采取经济措施应对“萨德”系统可能性不大》，2016年7月19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19002500881?section=search>。

③ 《“斩草必须除根”……尹炳世部长反驳了中国的压力》，《朝鲜日报》2016年7月25日，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6/07/25/2016072501669.html。

④ 韩联社：《韩防长：部署“萨德”系统由韩国自主决定不受中俄影响》，2016年7月11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11004300881>；韩联社：《韩防长：“萨德”系统只是个炮兵连，或部署山区》，2016年7月12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12002500881>。

⑤ 韩联社：《韩政府：与中俄朝核合作和部署“萨德”系统并行不悖》，2016年7月12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712004200881>；韩联社：《韩驻华大使：即使存在摩擦因素韩中也可实现双赢》，2016年3月17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317003800881?section=search>。

制措施所带来的恐惧。

第一，韩国政府在失落感的支配下，认定中国反对部署“萨德”系统是侵犯韩国自主权的行为。在韩国正式公布部署“萨德”系统决定后，中国立刻表示坚决反对，导致韩国决策者的过度乐观心态因与现实不符而落空。在此之后，韩国决策者的情感再次产生巨大波动，由过度乐观进入过度悲观的状态。其显著体现在于，尽管韩国战略界公认“萨德”系统事实上并不能为韩国提供有效的保护，但韩国决策者开始非理性地将部署“萨德”系统与韩国的自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相联结，以悲情叙事凌驾于现实政治之上。^①

带有悲情色彩的叙事贯穿经历“萨德”事务的三任韩国政府。朴槿惠率先将“萨德”系统与韩国自主权绑定，在2016年“光复节”的演讲中，将部署“萨德”系统称为“攸关国民生命的问题”，因此认为其不能成为争议的对象。^②朴槿惠还以此批评当时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访华的行为，指责其“扰乱国民思维”，破坏社会团结。^③在被弹劾停职后，她还继续发表相关言论，认为如果推翻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韩国“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④代行总统职权的黄教安延续了这种悲情叙事，认为“萨德”系统是“维护韩国国民生命与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必须进行部署。^⑤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后，韩国政府决策中强烈的感情色彩曾有所弱化。然而，在朝鲜举行第六次核试验后，文在寅的态度明显趋于强硬，决定放弃此前的审慎立场，要求立刻完成“萨德”系统部署。^⑥他在朝鲜第六次核试验后发布的立场文件中指出，为保护国民生命和安全，不能再推迟“萨德”系统的临时部署。^⑦韩国政府的其

① Mel Gurtov, "Diplomatic Remedies for THAAD Madness: The US,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15, no.6 (2017): 1-7.

② 韩联社:《详讯:朴槿惠光复节致辞敦促朝鲜立刻停止核武开发》,2016年8月15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815001400881?section=search>.

③ 韩联社:《朴槿惠批评在野党议员访华讨论“萨德”问题》,2016年8月8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808002100881?section=search>.

④ 《朴槿惠:若“萨德”入韩决定被推翻,韩将不是主权国家》,环球网,2017年1月26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03Xg>.

⑤ 韩联社:《详讯:韩代总统新年记者会强调“萨德”入韩必要性》,2017年1月23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0123002300881?section=search>.

⑥ Takeshi Watanabe and Osamu Koike, "The Korean Peninsula: ICBMs and the New South Korean Government's Alliance Politics,"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d.),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8* (Tokyo: The Japan Times, 2018), pp. 92-93.

⑦ 《文总统:“萨德”部署是预防战争和保护人民生命的最佳措施》,韩国《中央日报》2017年9月9日, <https://news.join.com/article/21920480>.

他高官也多运用类似的悲情叙事。例如，在“萨德”系统部署决定公布前后，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表示，“如果屈服于中国等国家的反对，韩国就会变得不像个国家”。^① 时任总统府国家安保室长金宽镇在2017年初访问美国时甚至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系统是有关自主权的问题，中国反对也无所谓”。^② 这些悲情叙事实际上限制了韩国决策的空间，将部署“萨德”系统这一策略性的举措与极为敏感的韩国自主权与安全问题强行绑定，导致决策脱离现实，缺乏灵活性。因此，在中国明确提出“萨德”系统X波段问题以及“双暂停”和“双轨并进”思路之后，韩国政府未能及时做出妥善回应，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下滑。^③

第二，韩国受信息处理方式的影响，指称中国大规模限制两国经贸往来。在中韩外交危机期间，韩国政府与媒体多次指责中国对韩国企业施加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对此始终平淡回应，指出中国一贯支持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但这需要一定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④ 相较而言，韩方对这一事态的反应要激烈得多，展现出了极强的敏感性与高度的重视。韩国央行预期“萨德”问题对中韩关系的冲击将拉低2017年韩国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⑤ 基于对经济发展下行的担忧，韩国政府多次向中国表示关切。如朴槿惠时期，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曾表达对反制措施的忧虑；^⑥ 韩国驻华大使曾联系中国外交部请求恢复韩

① 《政府迎头突破“萨德”……不能取决于中俄的强烈反对》，《朝鲜日报》2016年7月12日，https://www.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6/07/12/2016071200349.html。

② 《引发“萨德”冲突的安全负责人金宽镇》，韩国《中央日报》2017年1月12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1110890>。

③ 《王毅：解决半岛核问题应采取制裁和促谈并进思路》，人民网，2017年3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308/c1002-29131611.html>；《外交部：“萨德”监测范围覆盖中国大片领土，远超韩应对范畴》，人民网，2017年3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317/c1002-29152638.html>。值得注意的是，有参与反导系统建设的美军军官曾撰文指出，为实现半岛局势缓和，向中国政府就X波段雷达不针对中国做出承诺，甚至向中国政府披露X波段雷达运作信息都是可行的策略。参见Robert C. Watts IV, “Rockets’ Red Glare: Why Does China Oppose THAAD in South Korea,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U.S. Polic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71, no.2 (2018): 99。

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做出类似口径的表态，参见《2017年3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442434.shtml。

⑤ 韩联社：《韩中“萨德”矛盾暂画句号，需凝聚智慧避免重演》，2017年11月1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101003000881?section=search>。

⑥ 韩联社：《韩中FTA联委会首次会议落幕，韩方表达限贸忧虑》，2017年1月13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newpgm/9908000000.html?cid=ACK20170113004900881>。

企“乐天”在华营业。^①文在寅上任后，多次向中国领导人提及韩国企业遭遇的困难，表达推动两国经济领域合作重回正轨的希望。^②

中韩两国对经贸问题的不同认知体现了韩国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对错误知觉的影响。尽管近年来中国采取经济限制性手段的意愿有所上升，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辅助性地位。在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到挑战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进行回应，或因经济制裁所需付出的成本过高，中国并不愿意将制裁手段作为首选。^③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在经贸问题上处处针对韩国设置壁垒。然而，韩国决策者在中韩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倾向于高估中国限制的强度，将许多出于正常市场波动的现象归因于中国的反制。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2017年现代汽车在中国销量大幅下降一事。韩国政府与舆论界多将其视作中国对韩国的反制举措。^④然而，若仔细观察现代汽车在华的销量变化，可以发现早在2015年中韩关系尚处于“蜜月期”时，现代汽车就已经因中国国产自主品牌的激烈竞争出现销量下降的现象。^⑤而2017年的销量波动之所以较为剧烈，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汽车因资金周转问题无法支付在华供应商的货款而导致断供。^⑥由于韩国政府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倾向于将其可获得的大量市场波动信息均视作中国对本国的限制措施，其中难免有夸大与过度解读之处，由此导致韩国对中国的怀疑与畏惧进一步加深。

综上所述，在中韩外交危机之中，结构性错误知觉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受关注差距的影响，韩国的对华决策具有强烈的情感波动与“面面俱到”的信息处理风格，导致决策者在采取投机行动后，在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之间大起大落。韩国决策者对中国的疑虑由此不断加深，最终导致

① 《2017年3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50572.shtml。

② 韩联社：《详讯：文在寅、李克强就韩中关系发展重要性达成共识》，2017年11月14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114000100881?section=search>；韩联社：《详讯：文在寅会晤李克强大共商两国合作方案》，2017年12月15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71215006300881?section=search>。

③ 方炯升：《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65—87页。

④ 《现代汽车公司遭遇“萨德”系统报复式直接打击……在华销量下降40%》，韩国《中央日报》2017年4月4日，<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1436531>。

⑤ 《现代7月在华销量暴跌30%，不敌自主品牌》，人民网，2015年8月9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809/c1004-27432968.html>。

⑥ “Hyundai Motor Halts Production in China after Dispute with Supplier,”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0,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a7166950-8c9a-11e7-a352-e46f43c5825d>。

战略失稳（详见表2）。

表2 中韩外交危机中结构性错误知觉的表征

	情感波动程度	信息处理方式
过度乐观	韩国决策者过度自信地认为中国应当能够对朝鲜核试验做出快速决策	韩国决策者未能在中国释放的信息中辨识出中国的核心诉求，导致低估中国反制的决心
过度悲观	韩国决策者将部署“萨德”系统与韩国自主权和韩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相联结，构建一种悲情叙事	韩国决策者将中韩经贸往来中正常的市场波动也归为中国的反制，夸大了中国威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

本文尝试论证，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关系良性发展、缺乏充分预期的状况下出现战略失稳的重要原因，在于周边国家受结构性错误知觉支配而引发的外交决策失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结构带来了彼此之间的关注差距，并进一步导致情感波动程度与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由于周边国家的决策者的情感波动程度大，信息处理方式“面面俱到”，因此容易产生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的错误知觉，错判两国关系的真实形势，进而导致战略失稳的发生。中韩两国的外交危机是结构性错误知觉引发战略失稳的典型案列。2016年，《人民日报》“钟声”专栏多次针对中韩关系发声，其中的关键词“现实感”彰显了本文的主旨。^① 韩国将重要的外交决策建立在主观推断而非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是导致两国丧失“蜜月期”的成果积累，陷入外交危机的重要原因。

2020年，中韩两国克服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挑战，在王毅外长访韩期间达成十项共识，重建高水平合作。^② 这更加显示出，中韩建交25周年之际爆发的外交危机是在双方所不欲的情况下发生的，本应尽快完成的妥协却在战略失稳木已成舟后方才实现，具有极强的悲剧性。展望未来，中国同周边国家控制结构性错误知觉的负面效应，避免失落的“蜜月”重现，是建构命运共同体与维

^① 《韩国需要基本的清醒和现实感》，《人民日报》2016年8月1日第3版；《美韩不要在半岛问题上失去现实感》，《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日第3版。

^②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会谈达成10项共识》，中国外交部网站，2020年11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t1835759.shtml>。

护亚洲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对中国而言，应当充分理解周边国家出现错误知觉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做好预判和时间窗口的把握，在周边国家试图采取投机行为之前有针对性地发出坚定清晰的反制信号，而在投机行为被遏止后及时停止威慑并主动开展两国关系的安抚与修复工作，实现外交手段的“收放自如”。周边国家同样应当理解中国外交决策风格中的底线思维，从更加现实的视角看待中国的行为模式，充分认识到中国在重视周边和平稳定大局的同时，绝对不会在核心利益上做出让步。最重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应当超越地缘政治思维，实现政治上的相互信任、经贸上的相互依存、文明上的互学互鉴，努力尝试将周边地区作为实践“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起点与重点，确保各方在面对利益诱惑或错误知觉蛊惑时均能保持足够的定力。唯其如此，中国同周边国家方能避免战略失稳的反复发生，实现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A Missing “Honeymo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in 2016–2017

FANG Jiongsheng

Abstract Strategic instability poses deep challenge to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nd the most severe type happens when the bilateral relation is developing smoothly, and the two sides do not have enough anticip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argue that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brought about by asymmetric structure between countries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outbreak of such strategic instability without anticipation. In the asymmetric structure, the large country and the small country have different level of attention towards each other. This “attention gap” further causes the difference on the two countries’ degrees of emotional fluctuation and mean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hen facing bilateral relation, and in the end leads to the over-optimistic or over-pessimistic misperceptions of the small country.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shows that the ROK decision-makers are over-optimistic during the China-ROK “Honeymoon”, overconfidently view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ROK relations, while unable to distinguish the cor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alert. These leads to the speculation of ROK government that harms Chinese interest. And when China-ROK relations deteriorate, ROK decision-makers are over-pessimistic, regarding that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will harm its autonomy and safety of its people, and exaggerating the extent of Chinese counterattack. These misperceptions finally result in severe strategic instability. The key for assuring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to build a fundamental consensus of mutual trust on each other’s positive intention.

Keywords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neighboring diplomacy; China-ROK relations

Author FANG Jiongsheng, Ph. 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